

枝先吾兄：

您写字苦难，还写了长信给我，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非常感激。我幼年所见瑞云楼遗址，即在叶季堂先生家中，当时男主人已故，寡妻当家，二子一媳，长子椒岚在家养病（有时独住龙山书院），不久亡故。我的小同学叶宗泰是次子，其舅父沈少香，在念德堂教书，一度因我母带姐去沪，我在念德堂寄宿半年，即与其舅甥二人同室。在校与宗泰（号安孙）及朱家老三房公垂三个小同学结交甚深，后来宗泰在上海中国银行学业，公垂在南洋中学上学，我随父在钱庄学徒，三人在上海仍多往来（至今尚有人照片保存）。二人均已先后作古，唯我独存，老人恋旧，不胜依依。我近来身体转好，又想写点东西，其中也有写故乡童年的想法，可惜许多旧友凋分，记忆力衰，许多事记不清了，又无力重新调查访问。下列数事，不知您知道否？

1.我启蒙老师俞姓举人，家住郇家道地擂鼓墙厅内，您知道他的名字吗？

2.对朱家木行街念德堂小学（正式名实获小学），有朱兰后代的老二房子（当过学台）在同茂木行宫詹第朱燕生、湘生、鄂生兄弟三人主持，我最早老师是一个秀才，只记得叫任先生，也记不清名字。我很想写任老师和另一位沈少香老师，我现在能识字写文章，首先就靠二老师教育，他们的生活人事，对我的恩情，至今难忘。任老师家住六府庙东也，很清苦，一生教育儿童。您知道他的名字吗？朱家房族很大，子弟都是同学，现生存者，恐只有一二人，朱劲钧消息，你知道吗？（朱端钧^①，戏剧家，“文革”后已故，有子早在台湾经商，后无消息，可能有地下工作任务，已被害，牺牲了）。

3.凤凰山下东岳庙，大概已经毁掉了，我在那儿有许多童年故事可写。龙泉山那时候与现在面貌不同，亦常游之地。山下有鸿雪轩照相馆是

^①朱端钧（1907—1978），字公吕，浙江余姚人，中国话剧导演、戏剧教育家。

余姚唯一一家照相馆。

总之，可以怀念的事很多，但要写的事很多，不知道何时能写出来呀。浙江大型文艺刊物《江南》要我写稿，我想如能写出童年故乡的事，就可以在《江南》发表了。

您眼睛不好，我写那么多空话很对不起。我想，您一定在政协找一年轻人做秘书，可以帮您写写，你说他写，一定可以保留许多故乡宝贵史实。如有话给我写信，也可叫他帮你执笔，自己写太吃力了。

祝您健寿，合[阖]家安康。现在国家经济秩序急需[亟须]整顿，经济环境好好清理，人民生活比较紧张了，物价开放，倒爷翻天，对改革发展，大为不利，浪费挥霍太多，而人民生活就紧张了。希望这种情况，早能改变才好！又及。

楼适夷

（1978年）11月15日

【考释】

俞姓举人，为楼适夷的启蒙老师。1910年，5岁的楼适夷，向余姚城里有名的举人拜师开蒙。1911年，6岁的楼适夷进余姚私立实获小学，读了初小三年，高小三年，毕业后进修一年，共读了七年。1918年，小学毕业后的楼适夷进了他父亲任职的上海征祥钱庄当学徒。

枝先吾兄：

我是10月17日离京的，在杭州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一周，住了10天，就去上海，又勾留6天，于11月2日南下来厦门，即入鼓浪屿干部休养所疗养。这里气候温和，环境幽美，准备在此住过冬天，以避开北京的严寒，现在疾势缓解，自我感觉良好，每天可读书写作。

余姚县委的《党史资料》第六期，我见了你写的《郭静唐事略》，知



1984年，楼适夷在厦门鼓浪屿

道老友许多经历，前所未闻。有几点问题提一提：

1. 静唐浙师毕业，回姚任教，1924年转入共青团云云。当时余姚是否已有共青团组织？您这材料是根据什么的？

2. 《余姚评论》是哪年办的，我记不清。黄河清（似非何济）兄弟二人向军阀告密，通缉静唐，似与《评论》有关。那时静唐走沪。我记得他参加过上海地下国民党市党部工作（在当时法租界陶尔斐斯路），法捕房袭击党部，静唐从楼窗跳出，逃至我家，我还有点印象。时间恐在1926年

夏。当时沪市党部有杨贤江、梅电龙^①等人。

3. 静唐去盐场谈判，系4·12事变之前，并非以后。4·12事变之后不久，我们都受通缉追捕，是“清党”关系，非仅为盐场事件。

4. 静唐接办天马书店，时间当在1932年以后，天马是1932年创办的。1933年秋我被捕后韩尚在世，静唐接办，在韩死后，韩是哪年死的，我在狱中就知道了。此事可打听楼炜春^②核实。我1937年出狱到沪，当时静唐尚在天马，可能他在1938年才回余姚。

5. 我是与静唐一起北撤的，到达淮阴后，华中局留下我与黄源，黄源办文协，我入《新华日报》华中版，静唐未留下即随部队去山东，未任苏皖边区文协常委。

以上五点，请您核实一下。又《余姚评论》与《余姚青年》旧报刊不知在余姚尚能找到否？1927年县党部时代，《余姚评论》曾复刊，作为党部机关刊物。

您编写家乡《先烈史传》，这工作很有意义，现在能找到一些年轻同志帮助您深入做这工作吗？

此期《资料》还刊载我的一篇旧作，这种抒情文章做党史资料，极不合适。关于朱亚之还可深入调查吗？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专此即颂寿康。

适夷

1980年11月21日于厦门鼓浪屿干部休养所1404号

【考释】

1981年，余姚县委建立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对余姚地方党史、军史、革命史开展征集活动，经抢救性挖掘，留存下大批的历史资料。从1982年

^①梅羹彬（1901—1975），名逸仙，字电龙，湖北黄梅县人。中共情报史上的杰出人物，抗战三杰之一。

^②楼炜春（1910—1994），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楼适夷堂弟。1932年在上海创办天马书局，曾出版《鲁迅自选集》。

开始，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定期编印《余姚党史资料》。



《余姚党史资料》

天马书店创办于1932年，主要创办人是韩振业、楼子春、楼炜春和楼适夷。其中，韩振业任经理；楼炜春任副经理；楼适夷担任编辑，负责组织书稿。韩振业、楼炜春和楼适夷都是浙江余姚人，大革命时期，郭静唐、楼适夷、韩振业、张一渠等人共同参与革命活动，支持农民运动和盐民起义。

枝先大兄：

示悉。此次未能如姚，深感不安。15日我写了几句献词，挂号航空寄出，想可收到，不管是否有用，聊表心意而已。此信到时，纪念仪式可能已经完毕了。吾县不是对外开放城市，缺乏新式现代化招待设备，正表示我地方领导机关，平时一心领导生产，不事铺张，习惯朴素生活，是很好的风气。只是临时有所必要，一时难以筹措耳。我们有四明山老根据地，实际也可开辟风景区，河姆渡遗址发掘后，声名甚大，旅游事业，也是有前途的，接待旅游的设备，也可以考虑。现代化建筑设备，花钱太多，其

实如有旧家故宅，池沼庭园，古式家俱[具]，招待外宾，也是很受欢迎的。可能比对一般化的西式招待更受欢迎，这样条件，可能比较容易办到。

上次小儿探亲北归，带来余姚瓷厂细瓷出品彩色照片5张，及一篇简单的文字说明，这本来是我建议在对外贸易杂志上作[做]宣传用。我转交那位朋友，她又送回来了，她说这刊物是专门对外的，宣传工作要与外贸措施配合。姚瓷要投入外贸，须先通过浙省外贸机关，安排供销渠道。她恐先在刊物宣传出来，立刻引起外商大量定货，生产能力是否足够供应，必须事先有所规划，因此不能贸然发表。请瓷厂先与地方及省方外贸机关办理妥善后，刊物就愿意宣传了。这刊物是属于外贸公司的，他们经常派人四出[处]探访地方土特产品可以投入外贸的，以后有人去浙江时，当介绍他们到余姚来采访。此事请你便中对施君转达，彩色照片，当妥善寄还。

15日我写了横幅寄您，中午又接待五六位友人共餐，下午得到电话，老友萧三^①在医院病危，即驱车探视，回家后又招待一位外地过京南下的友人，留宿共话。一天活动，昨天就疲劳而不想动弹了。身体实在不行了，我羡慕您高龄清健，现在只能认真治疗，好好息养，希望能够恢复正常，此生尚得重见家乡也！此复。

即祝健寿。

适夷

（1983年）5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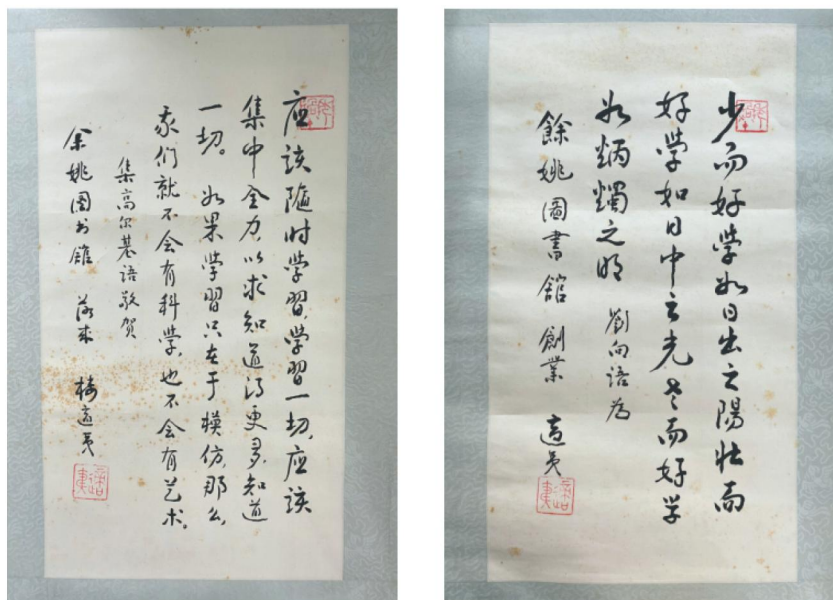
枝先吾兄：

10日大教敬悉。

出版社印诗集一般很少，《诗存》印了12000册，已算例外。我自己买

^①萧三（1896—1983），原名萧子暉，萧子升之弟，湖南省湘乡县人，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曾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一起创建新民学会。

了250本，分送友人，想再多要一点，不肯卖了。出版物，一般都全部交新华书店发行，出版社保留少数。各地分店只能由新华书店分配。《诗存》篇幅单薄，内容贫乏，乡友热爱，深为感谢，要满足供应，恐有困难，我自己对出版社提出，也有不便。我已辞去顾问，万事不问，也不算离休，文化部给我一封聘书，头衔是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亦为空头衔。主要的现在不负社会责任，尽可能自己写点东西，那是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实现，可人已老了！



楼适夷为余姚图书馆题字

托出版社同志，配备一些书，不料时间一拖再拖，主要的成套的书，一时配不齐全，现已嘱咐就已配好的，装箱运寄到余姚人民政协姜枝先同志收。大概即可办成，装好了箱，我先寄一个书目给您。只是一些普通的古今中外文学书，目的供家乡青年阅读。如果现有每日公开的图书馆，最好，由你决定捐赠何处吧。文献馆如不外借，仅作藏书，则不必给文献馆。

布衣、张蓬同志均有信，承他们都热情帮助儿子调动事，甚为感谢。儿子现已回内大，交涉如何，未见来信，希望能顺利调成就好了，谢谢你的关怀。

舍从弟楼炜春，来函定19日回姚，届时当可晤叙。
祝健康长寿。

适夷
1984年5月16日

【考释】

《适夷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1974年，余姚图书馆迁入北滨江路县文教局大楼。1985年，正式更名为余姚市图书馆。1987年，新馆落成并搬迁至图书馆路，1989年5月16日正式开放至今。1988年11月，楼适夷为余姚图书馆题写“贺余姚图书馆新馆落成·适夷”字样。



楼适夷题写的“余姚图书馆”馆名

枝先吾兄：

厦门复兄一信，想已收到。我已于昨日飞抵上海，暂住女儿家中，上海老友多，不免稍作往返。你去杭开会，我可以在你开会后与女儿葆衡同行来姚，临时不通知，到后即来兄家，万不可令人在站迎接，不吃请，不到那儿讲话，只见少数老友，请尽量少告诉他人，我只想看看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看看胜归山父母坟墓，看看（如果方便）四明湖，将来把骨灰撒在此处。再看看孙儿和媳妇，自问愧对故乡，希望不作[做]其它[他]活动，望兄与政协、党史组同志体会此志。

即祝健康。

楼适夷

1984年6月22日

【考释】

1984年7月5日，八十高龄的楼适夷参加完厦门举行的丁玲作品学术研讨会后，在女儿的陪同下归余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楼适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楼适夷在《适夷散文选》中有一文详细记载了此事。

回到家乡

一

车过曹娥江，已接近了家乡，山山水水，田野和青天，看起来都有家乡味了。盛夏酷暑，在满员的车厢，也觉得车窗中吹进的家乡风格外清凉。

多么想念我的家乡呀，再见它，算起来有整整二十七年了，这是一段充满了变动的、不平常的岁月。

195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虽然已感到亲朋寥落故人稀，但重上抗战胜利后匆匆告别的四明山，会见了战争中共同生活过的山里老乡，以及纵队北撤后留下来坚持四年游击战的新老战友，尤其是坐上了我特别

喜爱的传统交通工具——脚划船，瞻眺姚江两岸山清水秀的景色，和踽踽漫步自己出生的那条静静的小街，访问了几位仅存的老街坊，即使儿童相见不相识，仍感到特别地亲切。那次返乡，顺便作了嵊县、天台、杭州的旅游，稽延了一些时日，待我接到电令赶回北京去参加运动，已经是接近大鸣大放的余波，运动迅速转入“这是为什么”的阶段了。多少自己敬爱亲近的同志和朋友，在运动中陷入深冤，遭祸达二十余年之久，我因没赶上鸣放的高潮，成了一员福将。为了这个，我也应该感谢我的家乡了。

当然，十年浩劫，连福将也在劫难逃，无福可享了。但党和人民的巨力，终于把那些大奸悍妖所兴起的漫天黑雾归之于烟消云灭，在我们的头上，重新出现了明朗的天空。这几年，以退居之身，南来北往，年年都有机会往各处走走，年年受到家乡的召唤，年年渴念久别的家乡，甚至多次到了近邻的杭州，却还是“近乡情更怯”，竟无勇气踏上相去三小时的行程。人的思想感情是多么奇怪呀！

但现在，我终于在女儿陪同下，携着一条拐棍，迈动龙钟的躯体，回到八十年前呱呱坠地的地方来了。火车徐徐进入站台，站台挤满了迎客的人群，第一眼便望见了昂然矗立着的姜老枝先的身影，这是在家乡仅有的老友，几十年没有断过书函联系使自己和家乡间系上一条热线。他已是高龄八十三岁的老翁，八十多年中除了敌伪沦陷时期都幸福地生活工作在家乡。他深爱故乡，熟悉历史，几乎在乡在外的余姚人都认识他，而他也认识过去和今天的余姚人。也可以说：“此老者，余姚之大老也！现在他是县政协副主席，余姚梨洲文献馆的馆长，孜孜[兢兢]业业于余姚历史文物与人物记传的工作，从来不知休息。”我在行前几次写信给他，请他千万别劳驾到车站来接，可他还是来了。

二

迎客的小面包从车站向招待所驶去，本来是从小熟悉的旧街道，我都能一一记起它们的旧名，候青门、洪家道地、桐江桥、虞宦街、水门口、狗头颈，可现在却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新路，两边高低不齐的市房和店



通济桥

铺，已换成了一幢幢新式的层楼，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子，五光十彩的商店的玻璃橱窗，直通到姚江上的一条新的长桥。除了左边一条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下来的称为浙东第一桥的石拱三孔的通济桥也还认识，真是丁令威化鹤归来，城郭皆非了。

车子开入新宾馆，我们一行人被引进到现代化设备的房间，我一面酬对送我进来的新交的朋友，一面想起姜老两年前给我的信息。一个日本代表团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的先哲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年，特地来先生的故乡树[竖]立显彰功德的纪念碑。小县城第一次接待外宾，没有具有新式室内设备的招待所。姜老说：“我们有沙发床，没有新式的卫生设备，不能留客过夜，只好早晨从杭州接客人来，搞完一天的纪念仪式和宴会接待，晚上再送客人到宁波去休息。”那次我受到召唤，没能如愿回乡陪客，只想象家乡的各项生产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没想到县的领导却没时间顾到现代化的生活设备。事情相去两年，我们却已进入了设

备全新的新客舍。

我是应邀作为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客人回家乡来的，主人俞善章同志、章亦平同志，要我提供一些大革命时期我县党活动的资料，却优先安排了合乎我们愿望的节目。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龙泉山，瞻仰新建的子陵、阳明、舜水、梨洲四座乡先贤的纪念亭。子陵亭和舜水亭的匾额，是我受姜老的委嘱，在北京特地请书法家舒同和友人周而复书写的，现在见到了自然亲切。我们又看了日本代表团所树[竖]立的朱舜水先生显彰碑，然后到了由旧龙山书院改建的梨洲文献馆。文献馆是历史文物的陈列所，收藏丰富的文物和古籍，也是一座藏书库。姜老是这个馆所的热心的发动和主持者，他为这事业献出了解放后全部的精神，作为大倡“四旧”的罪人，他为此曾戴着高帽子游街。现在，姜老又精神矍铄地扶杖上山来重整馆业，而且更加发扬光大了。

从杭州与我同行的史莽同志，不仅是一位诗人和文艺理论的战士，又[还]是古文物的专家，省的文物管理机关的领导同志。我们游观了每个展览室，馆里的同志一次次端出收藏着而没有展出的文物，请史莽同志鉴定和欣赏。我们看到漆光闪闪的瓷形砚台有“大汉十年，萧何题”的字样，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品物。很多东汉的铜镜，虽然有的已成碎片，但细致典雅的纹样，仍然是很宝贵的。晋唐墓葬出土的许多陶瓷器中，由于自己见闻狭隘，第一次见到烧制了墓志文字的青瓷罐。更大量的是五代、宋、元以来历代青瓷器，全是家乡出土的遗物。二十七年前的那次返乡，曾见到晋墓出土的大量晋砖，农民们把它拿来铺路，我累赘地端了一块大砖头一直带到杭州，寄存在黄源同志的家里，准备带去北京。那时杭州城正在鸣放，黄源同志忙着开会，连陪我游湖的时间也没有，我寄身在旅馆准备写此行的行记，一个电报把我叫回北京，那块大砖头被落在杭州了。

三

下一个日程是上四明山，在我是重游，而同行的史莽同志和我的女儿则为初旅，很多当地的主人陪同我们，还带了出生十年、还是初次见

面的我在家乡的一个孙儿。不消说，四明山已不是抗战根据地时的四明山，同二十七年前与战友黄忠仁同志、陈布衣同志等的旧游，面貌也大大地改变了。

当年游击纵队中心区域梁弄和相去不远处的横坎头村一带，已经出现了一座大水库，浩淼[渺]无际，处处露出的山头和高地，形成罗立的岛屿，波平如镜，银光闪烁，俨然一个天然的大湖，大家称它作四明湖，而实际上，这儿正是抗日根据地时期留下了多少战友足迹的丘田和山路。有一大片种稻的田野，叫旱田畈，时常缺水，数日不雨，刚下种的秧苗，就得活活晒死，因此旱田畈也叫作晒杀畈。我一直记得，有一次在梁弄的行政公署开会晚了，已接近午夜，一个人回横坎头村的驻地，踽踽独行，忽然发现暗影中，一位老乡俯卧在山道边的小沟沿，正在用一只小洋铁罐，一罐一罐汲取山沟里流下来的一股细流，汲一罐，翻手倒入另一边的苗枯欲死的一块秧田里，一个小铁罐能汲多少水，一大块旱秧田又需要多少水，而他就这样通宵达旦地进行这样的灌溉。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叫《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举的就是余姚某农村缺水的故事。水，在这儿是琼浆玉液，连一小罐也是宝贵的。二十七年前我在横坎头村见到挖土方的农民们，以为全国到处都在搞小水电，并没加以注意。到六十年代初，从家乡的来信才知，这儿已开发了一片汪洋的四明湖，一座大水库可以灌溉多少万亩的土地！仅仅为了这个湖，我也想回乡来看看，因为那正是当年那位老乡用小铁罐汲沟水的地方。现在，我终于见到了它，清莹的水和坝下闸门奔腾狂吼的浪涛。当年的那位老乡年龄比我大得多，我不知道他来不来得及见到这片大湖，愿他放心地安息吧。

湖边的狮子山头，是当年为消灭敌伪据点，夺取梁弄镇建立根据地中心而反复鏖战的旧战场，在我一九五七年重访的一次，还见过一棵棵被炮火烧秃了树冠的乔木，正在抽发新枝。而现在，在最高的峰巅，攀登宽阔的百级白石台阶，已树[竖]立起巍峨的丰碑，一座抗日战争英雄烈士纪念塔。两年前不幸在杭州逝世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遵照其生前的遗嘱，把骨灰撒在四明



1984年7月，楼适夷在四明山革命烈士碑前

湖的清流中了。我和同行的同志们，面对雄碑，缅怀在最困难的战争时期与浙东人民共生死、同患难，和老乡们亲如好友的何司令，而肃然致敬。

二十七年前与我同游的熊国耀同志，现在是六十岁的离休老人了。他最近曾给我来信，说正在申请，准备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漫游当年北撤故道和亲身经历的解放战争的战场，党的领导考虑他的年龄，没有给予批准。今次返乡，旧游重叙，朝夕相处，一起行动。他带着我的孙儿，逢山登山，逢水下水，急得我连声呼唤，还是不肯回头。多少成长在战斗中的同志，青春永在，六十、七十岁的老人，往往把自己当作十六七岁，好像是不会年老的。

横坎头村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也是在我当年访问之后创立起来的，

是抗战后期浙东报社驻地的大院修缮扩建的，创立以后，我还不及来此瞻仰，“内乱”中就遭到了惨重的损坏，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阶级革什么阶级的命，从这抗日根据地规模不大的一座烈士纪念馆的沧桑，也已说明了问题。破坏者而今安在，纪念馆又庄严地重兴了。正中的纪念堂上，从余姚第一位共产党员杨贤江同志、大革命失败后惨遭杀害的费德昭同志开始，抗战前后在战场上、刑场上、牢狱里壮烈牺牲于敌人屠刀下的大部分当时是英俊青年的男女同志，相识的和相知的，一幅幅巨大的烈士遗像，供奉在正中与左右三边的墙头。他们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一行。想着他们的赤血培栽成长我们的新中国，很多人泫然欲涕。谁要是忘却了他们所完成和他们所交代我们继承的事



1984年7月，楼适夷在浙东区党委旧址、四明山纪念馆前

业，我们就必须请谁来感受这个殿堂的气氛；谁要是以为今天已挨到他们做官当老爷，当土皇帝，搞一言堂，弄权行势，以党营私，大搞不正之风的日子了，那末[么]烈士们的锐利的眼睛是会看见他们的。执事的同志端出册页要我们一题，我便急就写出了这样一首七绝：

四十年前横坎头，故园今日又重游。
当年战友音容在，豪气英风万古流。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

我们到了当年纵队司令部与行政公署驻地的梁弄镇。原来的一条山区老旧零落的街市，已完全改变了面貌。整洁的市房，大部分是重修和新建的，一座红色人造大理石墙栏和电镀玻璃门窗的四层大楼，高悬“上海产品试销店”几个大字的招牌，是这里新建的百货大楼。玻璃橱窗和柜台，银光闪闪的货架，陈列着只有城市中才能见到的高级的大众化的各式商品，对比当年低暗的旧商店，说明近年来农村，也包括山村人民生活正在蒸蒸日上。回家乡的愿望之一是想看看农村，时间短促，活动频繁加上我毕竟不是十八而是八十的老朽，不得不在中途，从招待所迁入了医院，未得亲访农家的机会，但梁弄镇街头的繁荣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浙东行政公署及教导大队旧址

下四明山回招待所，在晚餐的餐席上，听县党政领导同志介绍这个原来的农业县，人口密集，土地稀少，已渐渐进展成工业县。全县地方国营的工厂已达二百家以上，最大的厂已容纳三千多名工人，连同各乡镇社队的集体企业，大小工厂的总数已到达二千家之多。全县生产总值、工农业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工业超过了农业。离土不离乡，农民转成工人的人口在逐渐增多。特别是今年中央第一号文件发布以来，这趋势正在长足推进。全县现在万元户的统计数字也在天天上升。

我们经历过各个时期，都听到过一片“形势大好”的宣传，今天的见闻却不是文字和口头，而是具体在人民中间发生的事情。现在的故乡，和静悄悄、懒洋洋的从小相识的旧城镇相比，有多么大的变化呀！

四

我们的第三个日程是参观河姆渡出土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部落遗址的文物。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家后约一年，作为挂起来

的干部靠边幽居，与外间往来很少，一个在杭州工作的侄儿写信告诉我，在家乡余姚的河姆渡村发掘出七千年前原始部落的遗址。这消息使我非常兴奋，多少带一点自豪。我在1960年参观过西安半坡原始社会部落遗址，现在就在自己老家，发现更早了一千年的遗址。好像小的时候，在家乡中也听到过这样的地名，沿姚江东流的边岸，有不少用“渡”字做地名的村镇，如下陈渡、姜家渡等，这河姆渡离我们城东的老家应该是不远的，我非常想回家乡看看，但那时候是不可能的，寻找报刊的记载，也只是寥寥几行简讯，可心里一直是悬念着的。一直到现在才实现了还乡梦。

人家告诉我，这儿和半坡不同，半坡是把开发的遗址围上栏杆，架起玻璃天棚，成为一座博物馆供人展览，但这儿在遗址发掘了部分之后，出土了大量遗物，又重新用泥土封盖起来，回[恢]复了庄稼地，已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是把出土物建立了仓库，也没有开放展览，只是内部的一个工作站。但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从杭州同行的史莽同志，是专为这河姆渡而来的。

河姆渡离城区水行三十五公里，我们在通济桥边坐上小汽轮，一行十余人，由县文物管理员许金耀同志向导，向东行驶。一出市区，顾盼姚江景色，泱泱江流，波平浪静，南北两岸，各形成相对平行的绿带，装点着这约二百米宽阔的江面，广阔的田野，早禾已经黄熟，迎风摇曳，是接近收获的时节了。处处村落、行人，驶过近江岸的小山，便远远望见南岸岗峦起伏，连绵不尽的遥岭，那是四明山区。夏季的阳光是骄烈的，江上的清风拂拂吹来，令人忘却酷暑。多少年来，在三千里外时时入梦的家乡景色，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连汽轮击水的咄咄声，也是轻柔而悦耳的。舟行近三小时，我没有想到它离得这样远，在谈话中，才知河姆渡村原来在慈溪县境，解放后慈姚重划县界，把余姚作为产稻县，慈溪作为产棉县，把余姚棉区划给慈溪，而慈溪的稻区则划入余姚，因此这个河姆渡就归了余姚县。有的人以为把经济作物区划给了慈溪是余姚人吃了亏，可这儿赢来了一个河姆渡，它一下子闻名于全国与世界，给历史考古开展了新的篇章。

河姆渡村到了，汽轮靠岸，一上岸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河姆渡工作站的大门。许金耀同志带领我们进入现场，为我们介绍站里负责的同志。这位许金耀和几位接待我们的同志是这个遗址的最初发现者。1973年6月，罗江人民公社在河姆渡村外兴修水利，建排灌站，挖掘土方，掘出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的破片，立刻报告了县文化局。文物管理员许金耀同志当夜冒雨赶到现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马上要求把现行土方工事停下来，此事很快通过县局报告到省里。这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许金耀同志指指旁边一位工作人员：“那时上县来报告的就是这位老杨同志，当年是民工。”

1973年还是“四害”横行，到处正搞内乱，学术空气完全窒息的时候，省里的文物考古部门一位负责同志，开始得到了报告还不敢相信，等到送来了几件出土的黑陶，才连忙从杭州赶到现场，找不到适当的交通工具，乘的是一辆消防车。许多专家、考古工作者及时赶到，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工作，才进行了最初的发掘。1973—1974年做了810平方米的第一期发掘。以后到1977年又做了更大规模的2000平方米的第二期发掘，先后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石器、骨器、陶器、木器、玉器完整和比较完整的便有七千多件。

我们进入了工作现场，这儿是一座长方形的宽大的平房，像一座工厂的厂房，是陈列所也是工作场，一行行高大的木架、玻璃橱、玻璃柜，满眼是各式各样的古物，使人立刻觉得进入了上古的世界。

向导同志首先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玻璃圆盒给我们看，盒内填着一层棉花，装着一些黑色的谷粒，这是第三、第四层大量出土的稻谷的标本。他又指给我们看陈列在玻璃柜内的褐黄色的锄头、铲子似的骨片，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用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磨制而成的骨耜，刃部薄，柄部厚，上窄下宽，柄部钻孔，是插木柄的。那是开辟农田，种植庄稼的农具。按照古籍的传说，中国最初的农业，是从神农氏开始的：“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神农乃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生活与劳动在这儿的原始居民，才是真正的“神农”，而且他们的年岁比书中的神农要大二千岁。

出土的猪、狗遗骸，经过鉴定是人工驯养的，还有某些人工栽培的食用植物，说明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也已有相应的发展。原始的不稳定的采集经济，已进入以人力培养为主的农牧经济，人民生活得到相当的安定，渔猎经济退入辅助和补充的地位了。

在这片山林茂密、江面广阔、气候湿润的地方，生长着各种动植物，供人们采集和猎取，我们看见虎齿、鹿角、象牙的碎片和各种水生动物的化石。茂盛的林木，又成为建筑住房的材料。根据历来出土原始社会的遗址，说明在黄河流域古人的住居，是按穴居、半穴居到地面建筑发展的，在长江流域，则以巢居、半巢居、地面建筑的形式发展的。这儿堆积了大量木材的断片，显然是建筑物的残迹。许多段木头上留着榫头，他们用蠢笨的石斧、石刀，已经具有在木头上精细加工出互相结合的技巧，那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对环充四周、五光十色的陈列物，目不暇接地做了走马看花的参观，真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光买几个烧饼吃，让行家的史莽同志去过细地品味，便出了工作站的北门去看那片已经被覆盖的土地。那儿已恢复了一大片农业生产队的晒谷场，光秃平坦的土地上，



1984年7月，楼适夷参观余姚河姆渡遗址

踩着脚下的有四个文化断层的遗址，留下了一行人的照片。不远的村子里，跑出许多农家的妇女和儿童来参观我们这些参观者。

因为这儿是海拔零米以下的低地，水位高，给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必须在冬季水位下降的时候才能进行作业，而且一边挖土一边须不断排水，经过发掘的土层已成一片泥沼，不得不加以覆盖，像西安半坡博物馆那样保持发掘原状，开展展览是不可能的。但按照全部遗址的四万平方米的面积，第一、第二期发掘的二千余平方米，还仅仅只有全部的二十分之一，显然，还有更多的宝藏埋没在这儿，等待我们去继续开发。

五

从河姆渡回来，史莽同志首先返杭，我则因近一个月的行旅，酷暑，紧张频繁的活动，兴奋与劳累而从招待所搬入了医院。

新建的中医医院具备一切放射、化验的检查设备，但使用的都是中草药的成药和医方，我这个从慢性转成急性发作的老年病，从来都是依靠服用和注射抗生素来强行压制，然后常常得经过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才得恢复。现在却完全使用了另一种疗法，用中草药得到了舒发，不仅很快地遏止了发展，而且很快地恢复良好的自我感觉。还在病房中接触一些新的朋友，到第三天就可以继续活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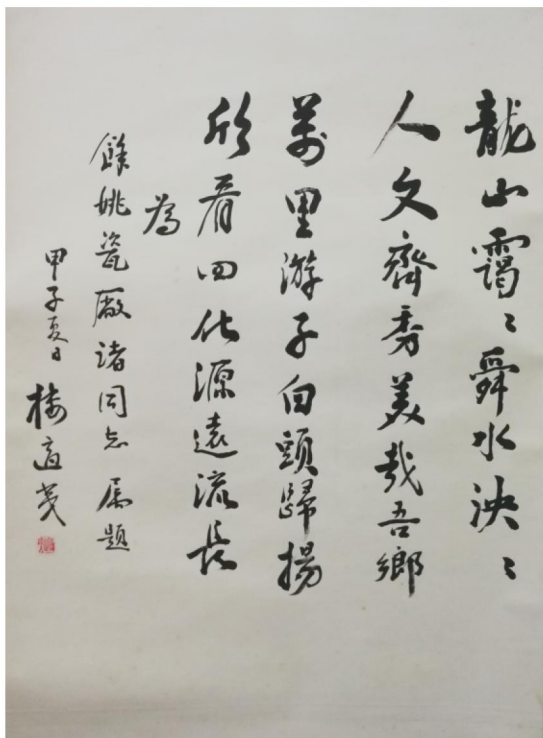
我到胜归山的公墓去扫谒了父母的坟墓，那是我在上一次1957年回乡时才迁葬了的。敌伪时期到处出现了盗墓之风，把我父母的坟墓也挖了一个窟窿，我在外闻讯只能托人做了草率的封土，直到解放几年后，建立公墓，合作化后在平野的坟墓必须迁葬和深埋，我才得托乡友在公墓中建造了新墓。这件事在内乱中不但作为地主阶级孝子顺孙为父母竖碑立传受到了批判，把保存的照片也没收了。而且在家乡破“四旧”的小将们打、砸、抢发展到死人的身上，进入了黄土还逃不过浩劫，把公墓的许多墓碑砸烂了。公墓又重新恢复，把破碎的坟墓重新修缮，却已经是失去原状了。以我诗岁的孙儿作为向导，我们终于找到了面目皆非的一堆黄坟和小小的碑碣，以默哀代替祭扫，也算完成了归乡的心愿之



1984年7月，楼适夷参观考察余姚瓷厂

一。人老了，前进之路日促，而怀旧之念日深，但怀旧也是一种策励前进的力量。

我们去参观了余姚瓷厂。这是几年来使我对家乡特别怀念的一种新兴、而又是继承传统的工业。也许有点“阿私”的心念。在我外行的目中早觉得所产白瓷的器物、文具、茶具、酒具和供列品的水平，比见到过的龙游、石湾、唐山的产品别有细、薄、轻质精形美的特点。1957年在四明山区的农村中，见到一些土质的碗碟，据说是一位民校教师，自己找到了山里的瓷土，手工烧制而成的，它的色泽和品质都使我很为惊奇。直到近年我才知道余姚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瓷厂，并幸运地得到了新型的产品。我曾经写信给《余姚科技报》，表示我的激动。现在我又有机会参观这家规模正在日益扩大，技艺上显然又有提高的余姚瓷厂。我以为作为一个农业县而发展工业，除了首先服务于农业及农产品加工而外，必须发展就地取材的工业，才显出一个地方的特点。地方的特产越是发展和提高，也越能扩展到全国甚至海外去。我相信与家乡的土特产食品一样，姚瓷有一天也将为全国所瞩目。



楼适夷为余姚瓷厂题诗

最后，与余姚、慈溪两县负责党史工作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座谈，谈了一些关于大革命时期两县党史资料之后，我不得不与故乡告别了。虽由于时间的短促，与归期的仓猝[促]，我不能在家乡物质文明的建设外，更多地了解一些精神文明建设的消息，但终于有机会因此行而结交了一些新的文化界、教育界的中青年朋友，可以加强今后的联系。虽然自愧背井离乡，对家乡建设事业没有涓滴的贡献，但我的心是紧紧联系着故土的，包括硕果仅存的姜老在内，我在别后得到他们一封封的来信，我又深感此行是我晚年中的一件大事，我是抱着“这是最后一次”的心理到家乡来的。虽知“人间到处有青山”，但故乡的泥土总是温暖的，故乡的水总是甜蜜的，我又生长了新的愿望，我还是要重来的。

1984年10月18日

枝翁吾兄：

得来信知兄健好，白内障剥除后，已有三分视力，大不容易，深为欣慰。茅公^①晚年，一目失明，一目只有0.3视力，每日仍写数百字，四年中完成了最后数十万言大著作《我走过来的道路》。当然像他这样的大家，别人是不能比的。你的《十八局》稿，太宝贵了，不可不请地方志办，能专派一个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同志，帮您写稿（整理），可以完成一件方志中的重大专题。越才^②世兄，既有重要任务，当然只能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好在兄健康状况良好，一定不难完成的。

你说的瑞云楼，我在小学时，同学叶安孙的家，即在此处，当时楼宇尚在，有一匾额，“瑞云楼”三字尚在，但中间楼板已无，形如高亭，小同学常在那儿玩耍。当时叶已丧父，长兄椒岚及母嫂同居，确为自产（是寿山堂内一个分院），我同学后在上海中国银行学业，早夭，其兄亦病逝，可能后来房产转移，成为莫氏私宅，又转钱姓，但从时间计算，你所



瑞云楼

①茅公，即茅盾。
②姜越才，姜枝先长子。



民国时期县长苗启平等三人在“二王祠”合影

说又为别处，且早已焚毁，就不可解了。现在如要恢复，当然赞成。但当时所见二王祠，是在龙泉山麓，阳明先生塑像，脸色深情，我也见过，则与瑞云楼又不在同处了。

记得八一年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年纪念接待外宾，您说余姚没有沙发床，没有抽水马桶，只好送客人去宁波过夜。而八四年我住通济桥边招待所，设备已经很好，次年我女儿、女婿，又到过余姚，则又有新的宾馆，规格更高，家乡发展真快，但愿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能这样快。现在我们大举改革。我辈老矣，子孙后代、民族国家还是要生存发展下去的，不大改而特改，可乎？这不是牢骚，我们的信心是永不动摇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兄以为然否？我现在身不大想出门旅游了。愿今后能多联系，同健共寿，祝阖家安康。

楼适夷

(1985年) 10月29日

(二) 章亦平

亦平^①同志：

《市志》^②早已收到，真是煌煌[皇皇]巨帙，老兄们十年辛苦不寻常。我到处写信告同乡人一定赶快买一部，5000册可能会一哄而光，此百年珍藏，子孙世代传家之书也！

我老在病中，去年住院三次，每次横入，准备横出，到今年一月，居然回家团叙，一家近卅人，子子孙孙（有的从外埠赶来，有的一家都在海外），四代见面，吃蛋糕，分红包，满满两屋子。还有人站着享宴，一个外人也不请。我反对做寿。出版、文学团体要专门开纪念座谈会，我一律拒绝，高寿可喜，但也不过近死更近，有什么可庆祝的。是老伴儿、儿女们硬做的，我还是从医院回家，坐轮椅行动，居然一次大团圆也有疗效，过了几天，我就出院。从此是不出步门，成了家庭病房的病人，医生每周来两次，送药，打针，有时吃药比吃饭还多，三四个月写不成一个字。外国药澳大利亚的脑活素一周两针，六月下旬至今每天写字上千，读书可万言，脑子活了。

《市志》放在手边，想起就翻，好处说不尽，缺点也有一点。如学校教育。我念小学那回，实获小学，仅次于县立学校（语文还高些）是以后实获中学的基础，也是余姚中学的祖宗，而《市志》竟不提名。我写了《我的小学》，发表《新文学史料》93年第3期，已寄上一本，请加指教。

《市志》大功成，您仍为政协主席，还是换届了？我的信由政协转，大概收得到，万望回示。

健寿纳福。

楼适夷

1993年9月2日晨

^①章亦平（1928—），浙江金华市武义县人，曾任浙江余姚中学校长兼书记，后任余姚县副县长，余姚市政协主席。

^②《市志》，即《余姚市志》，由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章公：

手示写得这样漂亮，可我还只能用圆珠笔写些奉复。我去年住院三次，二次是半夜，乘救护车急诊的。第三次今年1月才出院，有三四个月，一个字也不能写，医生每周上门诊视，可是老而不死，从六月至今，精力甚好，有抗病之力。可以工作了，医生规定每天二小时，我阳奉阴违，大概近不过三小时，记日记，写信，整理旧作（出版社嘱我自编选集），有时有兴，仍不免写点报屁股文学耳。

总的一句，《市志》苦心毅力，十年辛苦不寻常。世无完人，金无赤足，谁个能多少不留下一些缺点。慈溪与我们争杨贤江，可笑。还有一位大烈士应修人，他是当时的慈溪人，现已划归余姚，但我们没抢，不违反事实。此人为省委宣传部部长，拒捕，跳楼而死，应修人也。河姆渡本在慈溪，现归余姚，因发现遗址是在余姚，就应该是余姚的。乔石夫人郁文^①，原名翁郁文，她家原在慈溪，现地区划定，当然可以算余姚人了。她在四明山是鲁迅学院骨干，北指请她回家隐蔽。她叔公是翁文灏^②，舅舅是陈布雷^③，身份地位，留下有益，她哭着一定要随军，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才留下了。后来她（解放战争时）到上海来找关系，我作[做]证明，关系接上。不久同在北京，常常来玩，我一次问她，大姑娘可以结婚了。她说已结，爱人就是乔石^④，我吃了一惊：“从此你是官太太了，为什么还这么跑来跑去的？”她说：“莫讲笑话，我们仍旧是过去的老关系。”并告知通讯[信]方法。没有事我从不去找她。她爱人也认得我。我这么一个脾气，谁当了大官，我就绝迹，谁倒了霉，我烧冷灶。这次河姆渡纪念馆听说她来

①郁文（1926—2013），原名翁郁文，曾用名凌澜、林兰等，浙江慈溪人，乔石之妻。

②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宁波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著名地质学家。

③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官桥村人（今属余姚）。历任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④乔石（1924—2015），原名蒋志彤，浙江定海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了，还是一个大官老太太，她只是余姚的媳妇，八十多岁，电视里还常常见她。

方志办公室仍保留否？补充、增订一时不可能，但工作仍可留存，以便将来修订。此乃百年大计，当然能够实现今状，已了不起了。

亦平先生是否仍任职政协，主持方志？人老了，乡思更切，前有姜老，后他残废，现在姚只有一个远房侄儿楼常山，有时通通信，告知乡情，聊慰乡思。我无福在山清水秀的家乡养老，实为一生恨事，您老能始终为家乡尽力，做出不朽的贡献，我很羡慕。贵体想必健硕，深望时时得到手教，幸甚幸甚。

专此祝

健康长寿，阖家安康。

楼适夷

1993年9月27日

章老亦平同志：

来示拜读，迟复为歉。近年一直在病，写封信也困难，已有一年多未执毛笔了。嘱写碑文已万不可能，谨请另请名家写去，可请方家甚多，这次实不能承诺了，很对不起，伏请谢谢。

健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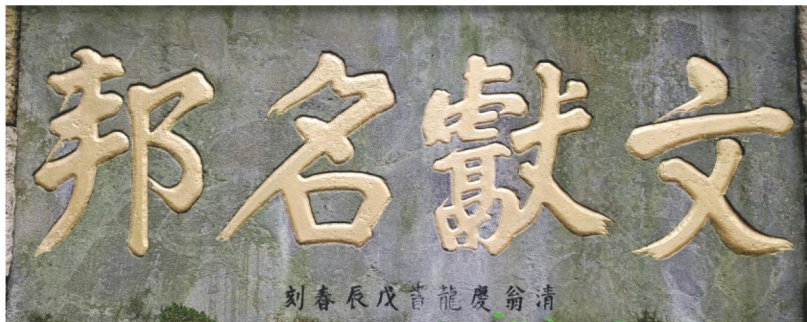
楼适夷手上

1995年5月18日

(三) 诸焕灿

诸焕灿同志：

十月四日示悉，我九十月间南行一月，十五日回家，收信较迟，稽复为歉。



(清)翁庆龙书“文献名邦”匾

关于余姚“文献名邦”匾额，以前是挂在县府大门内大仙楼屋檐下的，我幼年时常常见到，老师告诉我是明代钦赐的题名，但以后我从未加以考证，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的，可能与王阳明有关，您是否找一找《余姚县志》，可能会有记载，这县志幼年在家见过，现在文化馆不知有没有，上海图书馆藏地方志甚富全，如在姚找不到时可在上海找，专复。

敬礼

楼适夷

1980年10月18日

焕灿乡友：

廿八日示悉，一场大病，转危为安，住院卅余天，五月回家，十七日，舍侄孙楼舜年夫妇来访，亦托将尊稿带姚，他们廿日离京，中途当在

沪小留，命其到姚即送中天阁阁收下，如尚未到，他家住江南钱家弄十六号，可往问之，已到姚否？尊著定稿，当先托上海友人，向上海古籍出版社问之，再告。浙省古籍出版社，闻正将出版《黄宗羲全集》，另出《明夷》单本译注否？届时，亦可托人联系。尊稿被我搁置多日，甚为抱歉。即此，奉复。

顺祝成功。

适夷病复

(1986年)5月31日

焕灿同志：

乡贤研究中心公函早收稽复为罪。论文选编一辑正拜读，昨一下午读九华同志《明夷待访录》一论及兄下《续钞堂考异》，甚佩，弟于乡贤对梨洲先生最崇拜，故先读之，其他当陆续学习之，并想另觅先生记传年表诵习，九华兄仍任教育文化局长否？八四年曾一度识别，足下文字亦常拜读，欣吾乡之有人。老朽不才无学，学历乃念德堂小学生耳，那次回乡匆匆八天中病了五天，欲访母校不及，更不得与兄等多所请益为情。今既老且病，近月稍可，又念孔二先生《生无一所息》之义，稍稍写读，于乡贤仍思多读，闻研究中心成立大喜，天能假年，当竭力有所作为，有志于今岁内学近来以今译古之风，试译《明夷》，欲加详注，恐亦不当，即此祝贺春禧，九华同志均此候候。

又请教炳厘先生幼年见过，或知道？《年表》何处可得？《传记》何种较好？中天阁是否即在旧龙山书院？久疏毛笔，草草见谅。

米翁 楼适夷手上

壬申元七

1992年2月10日

焕灿同志：

廿四日示悉。同时得九华同志手教，已另复。近来由于自知息养，宿疾较缓，每日可执笔二三小时，思虑遂多，老人脱离工作，一个好处，多沉思冥想，以充实精神生活。自觉一生碌碌无为，为时不多，尚冀有生之年，多少能作[做]人民有益之事耳。

近来我关心的，第一是叶利钦，此人如何，尚难定论，在读他的自传。其次为梨洲先生，明代大儒，先民约论百年，著《明夷待访录》，视“君为民害”：“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在数千年封建时代中，实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之宏论，颇思有所钻研。但我的正式教育，实不过余姚念德堂一小学生耳。以后流浪外地，读书芜杂，虽以文为业，实一无所专，一无所就，垂老思之，愧对一生。这是实事求是之言，绝非过谦。读了你们论乡贤诸作，非常高兴。我生无为，而后起有人，亦是自慰。我现在独处斗室，步履已艰，已无力广搜群书，深入研考，知兄已完成《明夷待访录论注》稿，自当以先睹为快，可否寄示？京沪出版部门，相知尚多，大抵皆已离职，后起辈相识较少，但转为介绍，尚不甚难。当于读后考虑之。现在出版又逢□^①期，但真才实家之作，在此“拜金”时代，有时问世亦颇不易耳。批评不敢当，但相信读之，必可教益，便中望即寄下可也！

是为复，并请

文绥

楼适夷

1992年3月2日

^①此处原文不清。

焕灿同志：

三月八日寄下尊稿《贵宋义明夷待访录论注》及附信收到，我读书甚少，于乡贤著述近年始稍有涉猎皮毛而已，梨洲先生《待访录》先欧洲《民约论》百年，倡民主主义，其政治理想虽尚局限于君主立宪体制，实为我国政治思想史空前巨著，尊稿容当细读必将深得教益。出版问题，或京或沪，当于读后与友人商谈再告。来信承告省方亦列吾姚为全省六家历史文化名城，当无愧色，梨洲先生遗迹，存者必多，可以保留否？记得城中乌家道地当时有一座全姚唯一的三层楼，传闻为先生后人黄炳屋治学之所，不知今尚存否？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前汤九华同志信示及模型相片，规模可观，我已老迈久病，日就衰殆，斗室自囚，每出散步，亦感困难，屈时能否行旅，犹未可知，遥念桑梓，不胜依依，后秀有人，乃可慰耳。专此来复，余容再告，即祝

文绥

楼适夷手上

1992年3月14日

【考释】

黄炳屋(1815—1893)，字慰廷，号蔚亭，余姚县城人。黄宗羲七世孙。长为诸生，后中举人。好天文历算，著有《方平仪象》《两太捷算》《忠端公年谱》《梨洲先生年谱》等。

1991年10月，余姚市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焕灿同志：

前信想达，未得复为念。

尊稿留我处已久，我收到后是准备细读一遍，再考虑出版社介绍的，

已读了约1/3，不料3.21夜，突然旧疾急性发作，不得不入医院紧急治疗，卧床半月，始渐得缓和，但现在已一个月，仍在继续医疗，不能出院，起坐执笔，尚属勉强，担[耽]误了尊稿的处理。今天才能写信，非常抱歉。北京方面，专出古籍的，为中华一家，但中华已有问题一书，恐为重复而遭拒绝，上海有古籍出版社，我可托友人代为推荐，因病尚不及联系。从戎[我]读稿的看法，感觉兄于此书，用力甚深，实为钦佩，使我受益不少。但体例方面，以为尚可考虑。

1.书中每篇简要说明，为勿使读者具先入之见，是否可以不要，或作为题解，移入每篇之后，帮助启发读后的思考理解。

2.注解很重要，但有大部分似觉过于繁[烦]琐，如于一般文言文古语之词，一一用白话作注，对有一般水平的读者，便嫌芜杂。

3.对上一点，我以为与其作注，不如在每篇之后，除必要专词、地名、人名、时间、典故等一一注明以外，再附以全文的今译，对当前不习惯古语之读者，更为方便。

4.为理解及普及全书，是否可以在体例上作以上调整？

(1)总的说明；(2)原文；(3)每篇注释；(4)今译。

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我在医院，可能尚需一个时期，如先考虑调整，当即托人将稿寄回。（如有余姚便人可带更好），如兄愿意保存原体不变，我当设法与上海友人联系后，再寄往上海。（或杭州）你处如有便人，可来取，家中电话5029752，可向找黄炜（先以电话）约定。

即属回示，来信仍寄原址。

我的病状虽缠弥不休，但大致当可恢复，勿念，勿念。

敬礼

楼适夷

1992年4月24日

【附录】

四明山革命纪念馆：

来信收到，在战时南北奔走，我身边无可资纪念的四明山文物。1949年曾在港出版过一本所作的《四明杂记》，身边保存一册，固其中有个别记述不适当，我不愿此全书示人。最近选出六七篇，应金华浙师院编辑“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作品选”之征稿，已抄寄去了。又1945年浙东纵队北撤时，有一箱图书，无法携带，曾在横坎头驻过浙东报社的大院山边埋藏。是当地当保长的老乡经手的，名字已忘。这箱书是日文的，由我从城里托人送来，捐给部队，供当时日本解放同盟的朋友（原敌俘）阅读，如能打探到原经手人，从土中起出，是一件纪念品。但也可能已经腐烂了。又纪念馆成立时我曾写一七律条幅，不知尚在否？专此奉复。

敬礼

楼适夷

8月24日

文化局同志：

寄来《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大事记》（征求意见讨论稿）已收到。我因当时参加工作较晚，所知不多，年老记忆衰退，自己参加过的工作，也不能完全记得，能提意见不多，亦不重要，兹罗列如下！

《大事记》

P1，1941.5.10正文2行7行朱人侠是否朱人俊之误，还是别有人侠其人？

P15，12行，张峰是否张蓬之误？

P16，6行，《战斗报》社长丁岚应为江岚之误。

P18，9行，鲁迅学院（后迁横坎头）应改为（后迁梁弄，又迁横坎头）……16行，应添“有周振国、艾群、吴凌、陆始、劳郭等十余干部

任编辑”……

P21, 11行, “政治部的伊兵”, 应作“文教处的伊兵”……

P24, 倒2行, 《解放周报》不是在一厂印的, 它与抗币同一厂印刷, 地点在四明山深山, 大地名记不起了, 小地名叫元元墩, 大概即为三厂。我与告永为排校《周报》去过, 那里正印抗币。

P26, 倒4行, 《解放周报》是政治部敌工部领导,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浙东支部主办, 楼适夷参与。开始油印, 后改铅印八开四版, 内容主要发表延安电台发来的日文电讯, 并由敌工部编写由吉永、栗原、田中等日军官兵翻译。(这个支部起初只有这三个日本人, 后来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已有日军及朝鲜籍士兵共四十多人, 随军北撤, 到苏北送东北回国。)

P28, 2月26日, “浙东行政公署”下应加“连柏生为主任, 吴山民为副主任”。

P31, 5月, 柏林解放, 曾由政治部与行政公署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集会, 在梁弄。鲁迅学院的学员, 和王鼎山部队改编的五支队, 出了精彩的节目, 轰动一时。

又一重大的漏列: 四明山中心区的戏剧团体, 除文教处领导的社教队, 吸收旧艺人及培训新演员专演越剧以外。政治部宣传部所属还有一个专演新话剧的战斗剧社。领导的是宣传部江岚同志, 实际负责的我现在只记得一位袁云范同志, 他原来在北京八一厂编导了一个[部]描写四明山斗争的电影。电影名一时想不起来。——这件事可以向江岚同志了解。(原上海市委宣传部, 现已离休在沪——上海淮海中路1735号208室。)

现在写这一些, 想起来再提供意见。稿暂留, 未寄还。

敬礼

楼适夷

1990年3月31日